

2

棉麥大借款

著稼學鄭

時事留聲
3月
刊號

338.1
Du 81

時事問題叢刊

(3)

棉麥大借款

鄭學稼著



• 21 — 7 — 1933

目 次

頁數

一 借款的原因.....	三
二 借款之經過及其內容.....	七
三 借款與中國農村.....	一一
四 借款與中國工業.....	二一
五 借款與中國——結論.....	三〇
六 借款與國際關係.....	三九

一 借款的原因

過去的帳，不去算牠！

一九二六至二七大革命的政治上產物，便是廣東的國民政府，被中外公認爲合法的政府。她在財政上，因爲履行了段執政之『外崇國信』的名言，所以呱呱墮地的小孩，便負擔了鉅額的債務。

軍興之後的哀黎喘息未定，又在所謂『訓政時期』中體受了『南征北討，東蕩西除』的軍事行動。這些巨額軍費的支出，除向農村徵取外，不得不另找出路。這時候恰好遇到農村的『雙橋鎮』化（註）使地主豪紳們，陸續把現金集中到城市或受帝國主義一擗翼的區域。這些現金不能不求一個最適當置放的處所，於是內國公債的發行，以空前

的速度躍現着國民的眼前。由內國公債發行的結果，一方面有『中央政府』之軍事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有資產者之別開生面『躺在棺材邊』的生活。我們翻開上海浙江興業銀行所刊行之國內公債統計冊一看，牠的數目已超過八萬萬圓以上！

（註）見開明書局版茅盾著子夜

資本投放的目的，是獲得利息——最高的利息。這八萬萬圓的息金，究由何來？間接負載在中國人民的肩上。

如果中國的農村是安定的，如果八萬萬的鉅額是投在產業的部門，那麼，這些資本的利息的榨取，尙無如何的困難。不幸一切的事實都和這個願望相反。現實既然把重擔壓在中國工農的身上，而他們所得到的禮物，又是購買利器來殘害自己。於是中國的農村，便在人禍與天災夾攻之中，而奄奄待斃了。

因此，自資本主義社會出現於地球以來之農村與城市間的『剪刀』問題，在中國

的尖銳化，超過任何的國家。用全國勞苦大眾的血液來滋養幾朵不結實的花果，花果仍不能流轉到農村——因為農村經濟枯竭，失了購買力。

這麼一來，全中國經濟的生產行程和再生產行程，在目前好似都走到牛角尖裏去了。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尾閭。她的生產行程和再生產行程之不克圓滑進行，不特毒殺了本國的統治者，而且也影響到素來靠着吸吮中國工農大衆之血汗過活的帝國主義，使他們感到不滿足。

如果國際經濟是繁榮的，那麼，帝國主義對這脆弱的一環，會化些心思來修補。不幸目前是國際經濟危機普遍尖銳化的時候，帝國主義者不特不愛惜這個生金蛋的母雞，而且急進的日本帝國主義，還單刀直入，再拔去她身上的羽毛，和減少她的飼料。『九一八』的事變，就是個例證。

結果使中國政府財政的病徵，陷於連呼吸都感困難的地位。

依上海字林報六月十日所載之海關統計處祕書麥克伊文 (H. G. MacEwan)

中國對外貿易的報告，東三省各埠及大連的輸出品佔全國對外貿易百分之三五·四（一九三一）自被日本帝國主義不費力佔領後，就全部損失了。接着又發生了上海之戰，使佔全國對外貿易之半（一九三一年為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商埠的經濟，也陷於空前悲慘的地位。因此，一九三二年全國海關的收入，除水災附稅一二、二〇九、三六一海關兩不計外，只達一八八、〇三二、一〇九海關兩，比一九三一年減少五千八百六十萬海關兩，或減少百分之二三·五九。

這麼一來，的確是『火上加油』。暫不管全國經濟的再生產行程，感受極端的困難，對於素來『咽在棺材邊』的階級也為着息金有無之虞而發生恐慌。——自然，如無良法，連政治機器的運用，也都會發生障礙，尤其是使小資產者，會怒目相向。

我們再從國際不景氣來說，也使正在輕工業階級中過活的中國民族工業，『陷於大澤』之中。既不能運用關稅的壁壘，抵擋她的敵人，又有軍事上的屈服，國內外國工廠的林立，五步一關十步一卡之『阿房宮式』的稅卡，已經悲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了。再加大阪和蘭開夏棉紗業的傾銷，如無挽回的方策，他們只有『自刎烏江』。

因此，爲中央政府之財政計，爲中國民族工業之復蘇計，爲金融資本家之繁榮計，不能不籌劃出路。此出路爲何？即向外大借款是也。金融資本主義之美國，正苦資本過剩，投其所好，誘之以利，動之以害，必也情意相合。

於是，『六月四日，宋子文電行政院五千萬美金棉花麥子借款，已經簽字』之消息，遂披露於全國報紙之上。

二 借款之經過及其內容

關於借款的經過，以及條件的內容，尙沒有正式的發表，我們現在只能綜合中外報紙的記錄，作以下的簡述：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當未出國時，曾會同實業部在上海召集救濟紗廠會議。議案中『已經有賒購美棉的決定』（見六月七日晨報載華商紗布交易所理事胡筠籟氏的談話）可見國民政府與美國接洽借款之前，在國內已與實業界和金融界巨頭作過一度的相商。我們當時並未看到報上發表此類消息。只知道宋氏於逗留滬濱之際，忽膺經濟會議代表的使命。——事出如此倉忙。其次，世界經濟會議的地點，在於倫敦，而我們參加會議的財政部長既倉忙出國於先，又盤桓華盛頓直謁白宮新主人於後。可見所負使命，一定是很重大的。

宋氏由輪抵美，即乘橫貫東西之鐵路，直赴白宮謁羅斯福總統。由各通訊社的報告，所討論之事是『白銀問題』，其實重要的任務，除目前不得細知外，就是會同總統羅斯

福財長伍定暗中與財政善後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相商借款的條件。

這些條件，分述如下：

一、借款額 美金五千萬元。

二、債權人 美國財政善後公司。

三、擔保品 指定以若干統稅，如捲烟，麥粉，棉紗，火柴等為擔保。查此等稅收，在一

九三二年達美金二千二百萬元。

四、年限 三年，分期以所收的統稅償付本息。

五、付款辦法 五千萬美金之款，在條件中限定購買美國農產品，而以棉花為主。自條約簽定之日起，中國政府立即可以支用，惟所購貨物須向美商訂購，並於可能範圍內交美船運輸。其起運時期，悉聽中國主張，並約定貨物自棧房起運時，即

從借款內償付貨價百分之十五，其後於九十日內再付百分之十五，餘額於三年內分償，倘或延期，給息五厘。（大公報六月六日，圈由我加。）我們再看四日華盛頓合衆社的專電：『聯邦整理財政機關總理瓊斯氏今日宣稱，該機關已允借美金五千萬元與中國政府，以作購買美麥、棉花及麵粉之用。借款係由最近赴華盛頓與羅斯福及財長伍定會談之財長宋子文氏所接洽。宋氏現正在赴英途中，出席倫敦之世界經濟會議。預定五千萬美金借款中，五分之四將作購棉花之用，餘者用作購買小麥之需。據稱，借款定三年歸還，利息五厘。應運至中國之貨，在用作消耗以前，即為借款的擔保。中政府亦可劃出某種稅款，作為擔保。借款文件，由宋氏及該公司當局，在華盛頓簽字。瓊氏今日宣稱，麥棉之購買，全由中國經紀人在美進行，預定將購棉花九十萬包，麥一千二百萬斛。借款之成立，不但大有助於中國，美國亦同受其利。此間多餘之存貨，亦可大部份出售。中國之經濟狀況，亦得藉

此提高。自間接方面言之，美國之存貨減低，物價因之提高，世界亦同受其利。宋氏在簽定之合同中，有一條載明所購運往中國之麥棉，均由美船運載」（圈由我加。）

上面所有加圈的地方，都是我們所欲研究所欲發揮的要點。後文會加以一一伸述。現在我們先說此次大借款，對於中國之『國計民生』的關係。

三 借款與中國農村

我們把農村和這一次借款的問題，提前來論述，係指示這次大借款是和洋米輸入，前次美麥的借款，以及天災人禍，對中國農村具有同樣可怕的結果。雖然這個結果，目前會被人們忘却，而將來的優秀中國歷史家，對於中國社會總變動的分析，必然地要提到

這個血和淚的記錄。

『閉關自守』的階段結束後，中國最可悲的慘狀，就是受國際商品價值規律的支配。這裏我們所指的價值規律，決不是流俗經濟學家之『界限效用』的價值論，成本費的價值論，牠却是中國金融家工業家所雇傭之代言人，從來沒有讀過，而且就讀過也沒有完全了解過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商品的價值，決定於所化之社會平均必需勞動量。中國農產品，只要表現出勞動二重性，也就是只要牠成爲商品的範疇，牠的價值，自然也受本國價值規律的支配。但是，中國經濟形成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尾閭後，在關稅協定束縛下，中國的商品，更排棄了本國的價值規律，而悲痛地皈依於國際商品的價值規律。這就是說，中國的社會必需平均勞動的尺度，却是用國際必需平均的勞動量。

因此，十分顯然的中國的商品，尤其是農產品，首先感到國際商品價值規律的威權。

為什麼呢？

原來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本身又決定於社會的生產力，中國正在國際資本主義，按照自己形像改造的過程中，不管某些產業部門的生產力，有如何的飛躍，而方由封建胚胎中孵化出來的她，比國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生產力不均衡發展之害——也就是受資本主義社會，城市與農村隔離切斷之害，更為劇烈。因此，中國的生產力，在一方面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落後，另一方面自己之農村的生產力，又是落後中的落後。這樣，表現之於價值規律，便是為着生產力低微的緣故，生產同一農產品量所化之社會平均勞動量要比中國工業品多些，若與國際生產農產品的社會勞動量來比較，要更多些。如果用數字來表示，假設國際的工業品社會平均必需勞動量為A，則她的農產品為(A+1)，中國的工業品為(A+2)，中國的農產品為(A+3)——數字乃示高低，不是表示絕對的數量。至於國際農產品價值是否低於中國的工業品，在這裏是忽略的，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農產品價值的比較。——因此，中國的農產品價值高於

本國工業品，而兩者又均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

然而價值規律之支配一切商品生產的威權，每爲我們的眼光所忽略。我們能夠見到的，却是受價值規律支配之生產價格規律的運用。所謂生產價格者，是等於成本費加上平均利潤。按我們所知的，農產品的生產價格，是在牠的價值之下，工業品的生產價格，則在牠的價值之上。因此，工業品能按牠的價值去出賣可獲得超越的利益，即以生產價格去脫售，仍有平均利潤的取得。農產品呢？雖照生產價格出賣，仍不能支付地主的絕對地租，只有市場價格上昇到牠的價值，方會平衡。

但是爲着中國關稅不能自主，國際農產品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所以迫使中國農產品在自由競爭規律下，按照國際商品的價值出售，無疑這些價值（即前例之 $\Delta + 3$ ），是在本國的價值（前例爲 $\Delta + 2$ ）之下。因此我們十分明白了中國農產品在受國際商品價值規律支配，首先吃虧的，便是中國的農民。我們近來常常聆到各地『民食委員會』

之排擊『洋米』的議論，也爲着這個緣故。

這僅是最抽象的說法，如果再把中國之政治狀況，補充進去，那麼，由苛捐雜稅的抽括，使中國農產品的市場價格抬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牠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只有向國際農產品掛着免戰牌或『肉袒牽牛』作城下之盟——如果時髦些說便當高喊『長期抵抗』。

這個分析，表明了勞動價值論是超越一切其他說教者的理論之上。把上面的理論，用數字來表示，參考歷來代表中國地位和中小農之『民食委員會』各『專家』的議論，可以更證實上面論題之全部正確。

因此，中國政府要保障中國農民（農業勞動者，在本文中，是把他列在勞動階級中）不受外力（洋米洋麥等）的摧殘，只有用關稅的手段對外國農產品加以重稅。在『關稅協定』的束縛下，運用這個手段，其效力自然是百分之百的可疑；再由現實政權的

性質，免城市工業家的喃喃抱怨——因為對洋米等加稅，使麵包價格抬高，免不了增加工資，這樣便減少了工業家的剩餘價值。——只好置之不問，不他們反忍心地累次用借麥借棉的手段，殘酷地來掘中國農村的墳墓！

自然，我們上面的分析，是按事實來說，並非代中國的地主作不平之鳴。

中國的農村，按照地理的條件，使作物的栽培，有天然的劃分。這個劃分，從『南人食米，北人食麥』一語中，表現無遺。南方的農民，在洋米輸入中，早已悲慘呼號了，現在這個垂死掙扎的呼聲，又迫使北方的人民『共鳴』起來！

另一方面，我們再論中外農產品的品質：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泰晤士報，曾登載了伊文立(Rotarian A. Eveleigh)氏對於『中國穀物輸入之問題』的談話。這個談話，雖然沒有什麼經濟學的理論，然而却充滿事實和歷史的描述。他告訴我們：中國在二十年前，對於米麥等穀物，都能夠自給，